

第一回 聚群贤纵论建国策 兴中华奠定千秋基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重叠：先有西方列强的轮番侵入，后有东方日本的铁蹄践踏。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内战的烽烟重又燃起，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国民党，围绕着中国的命运进行了空前激烈的生死决战。

国民党兵多将广，气势汹汹。共产党士气高昂，英勇顽强。经过一年多的角逐和较量，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逐渐取得优势。

从 1948 年秋季开始，毛泽东连续发动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四个半月，三次鏖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173 个师，计 154 万余人。至此，蒋介石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土崩瓦解。

当 1949 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不得不发出乞求和平的《新年文告》，毛泽东则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双方最高统帅的不同姿态表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统治中国大陆 20 多年的蒋介石政权即将结束，毛泽东操舵的革命航船，已穿过惊涛骇浪，驶近胜利的彼岸。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四周群山环抱，是一个约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庄。1948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陕北不久，即辗转来到这里。

在村中一所较大的房子里，会集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共60余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中央书记全部出席会议。彭德怀、贺龙、林彪、陈毅、邓小平、聂荣臻、李先念等重要将领也都从各前方战场聚集到这里。全体与会代表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浴血奋斗了几十年，多少人盼望的那一天终于走近了！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经过民主讨论和决策，通过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国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健步登上讲台，作了指示性的报告。他向与会者宣布了新国家的全景式蓝图：

在政治上，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经济上，没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家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通过合作经济改造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外交上，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帝国主义

强加于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主权，并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根据互利原则发展对外贸易。

毛泽东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家，在空前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他准确地预见到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及时告诫全党：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中共中央机关即行准备进驻北平。这时，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已为中共中央选择了中南海作为办公地。他们来电报告：北平接管工作顺利，政治形势和社会秩序安定，请党中央择日启程。

3月22日，是中国革命的统帅部留驻西柏坡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要告别这个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奔赴北平了。

临行前的那个下午，中央机关的住处呈现一派异常忙碌的景象：刘少奇在和当地的一些负责人谈话，朱德在同前方各战场取得联系，周恩来在向负责沿途保卫工作的同志交待任务，任弼时在布置行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工作人员有的在整理文件，有的在收拾行装，有的出出进进在寻找着什么。唯有毛泽东的办

公室内，悄然无声，一片宁静。

他从办公桌前站起，缓步走到窗前，双眉紧锁，凝视着窗外，任思绪在无边无际的山川原野之间飞扬激荡。

28年的奋斗才迎来了今天的胜利啊！去日苦多，往事如昨。他的胸中思潮如海，昔日的风雨坎坷一一在他的眼前闪过……

1921年7月，他初出茅庐，即同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来到上海，与李达、张国焘、董必武等中共一大代表研究建党与救国大计。当时的中国谁也没有把他们几个穷书生放在眼里。倒是法国租界的一个巡捕盯上了他们。为防意外，他们几个赶紧撤出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小小游艇上继续开会。他们几个刚刚离开，法租界的几辆警车就风驰电掣般地驶来，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巡捕立即把举行会议的那栋房子包围了个严严实实。

当初要是晚撤出一步又会怎样呢？……毛泽东简直不敢这样设想下去，他的思维镜头在继续移动：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蒋介石却不容共产党分享胜利果实，对朋友举起了屠刀。毫无防备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危难之中，周恩来、朱德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而他本人则发动秋收暴动，率领一班人马杀上了井冈山。

1928年到1934年，蒋介石占据着大城市，却不给共产党在穷山沟一片立足之地。他调动数十万乃至百万军队，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剿。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红军最后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到1936年，万里征程，烽烟漫漫。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数十万红军，战湘江、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娄山关前残阳如血，大渡河上铁索孤悬……多少次出生入死，多少回浴血奋战。到达陕北时，30万人的三路大军只剩下不到3万。

1937年到1945年，敌后抗战，艰苦卓绝。前有日伪军的凶残扫荡，后有国民党的偷袭暗算。八路军、新四军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历经八载，才打出了几块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眼下的解放战争，共产党以区区百万的人马和劣势武装，对付800万装备精良的美蒋军队。多少人血染征衣，多少人战死沙场！

“今日的胜利是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毛泽东声音低沉，喃喃自语。

他又想到了自己一家付出的代价：妻子杨开慧刑场就义，二弟毛泽民被害狱中，三弟毛泽覃战死沙场，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除此之外，二儿子毛岸青街头流浪，被人打伤致残；小儿子毛岸龙弃置他乡，至今不知去向。

有情未必不丈夫。想到故去的亲人，毛泽东的眼睛潮湿了。

其实，毛泽东本人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遭受的危难比谁都多，蒋介石多次悬赏捉拿的共产党首犯就是他，真可谓九死一生！

在汉口，他和汪精卫政府的两个便衣特务狭路相逢，一个特务抓住了他的胳膊，大叫：“你就是毛泽东！”被他机智地摆脱了。

在板仓，敌人包围了他的住处，扬言要“活捉毛泽东”。他装成病人，乘轿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溜掉了。

在浏阳，他竟被一群团防队员抓住，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

上，用身上仅有的几块银元才换回了一条性命。

攻打长沙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军帽而过，裤腿也被子弹穿了两个洞。

在城南庄，敌机远途偷袭，三枚炸弹从天而降，落在他的面前 幸亏都是一些臭弹 才有惊无险 逃脱厄运。

在重庆，他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进行马拉松谈判。在长达 43 天的时间里，始终置身刀丛剑林，面对虎豹豺狼！……

想到这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当初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的。如果说是天意，果真有天意吗？如果说是侥幸，为什么侥幸总是和他不期而遇？他进而想到，要是杨开慧、蔡和森、何叔衡、毛泽民以及其他一些先烈也都能侥幸地活到今天又该有多好啊！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不愿过多地沉浸于幻想之中，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如何掌握即将到手的政权这个现实问题上来。古人云：“打江山不易 坐江山更难。”好多天来 他的头脑中经常萦绕着这个问题。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命运又将会怎样呢？会不会重蹈蒋介石的覆辙？他又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又旋即败亡的教训。那真是一个永远值得汲取的前车之鉴！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灭亡。一个流血流汗、历尽艰辛打下来的江山 居然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留下了“打江山十八年 坐江山十八天”的千古遗恨。

毛泽东在窗前伫立凝思了好久好久，直到夜晚，他躺在床上仍在古今中外地浮想联翩。他突然想到：李自成是农民的儿子，他也是农民的儿子；李自成领导的是农民起义，他的部下也多是

农民子弟；李自成攻入北京，他现在进入的也是北京。历史是多么的相似！尽管早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他就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给他的部下提前敲响了警钟；尽管这次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全党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尽管党内刚刚制定了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六条措施，但他心中还是充满了忧虑。他觉得此次赴京执政犹如赴京赶考，任务十分艰难。稍一疏忽，就会招致失败。但是，毛泽东相信，事在人为。只要高度警惕，兢兢业业，薄冰可履，功业可成。从下午到深夜，他的双眼熬得有些发红，直到拂晓，一直未能成眠。

第二天上午 9 时，汽车已经开到了门口。毛泽东收拾停当，准备上车。这时，周恩来谈笑风生地走了过来。毛泽东一脚踏在车上，一脚踏在地上，突然回过头来对着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理幽默而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恩来，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是进京的日子，让我们赴京赶考去！”

周恩来也是通宵未眠，但他依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主席，我们都能考试及格，不会退回来！”毛泽东接下去说：“退回来就是李自成第二喽！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李自成，也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这是胜利之师跨进历史凯旋门时发出的豪迈誓言。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了这一誓言，在新的征程中经受了执政的考验。

车队风尘仆仆，在华北大平原上行驶，一路经唐县、保定到涿州。25 日凌晨，毛泽东一行从涿州改乘火车，天亮抵达城北的清华园站，先往颐和园休息。

下午 5 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入城仪式。毛泽东头戴棉帽，身着棉衣，脚穿棉鞋，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一道，检阅了军威雄壮的驻城部队，并接见了北平市万名各界群众代表，接着又热情地和在场的 100 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会面。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进驻香山双清别墅办公。

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进入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

4 月 21 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共同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遵照此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动了渡江战役。

解放军百万雄师，在长达 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分中西东三路强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沿岸的顽敌。

这是历史性的大进军，各路大军的每一个行动，都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彻夜工作，阅读和批复前线的电报，于万籁俱寂的双清别墅，谛听着千里之外的江岸炮声。

4 月 22 日晚，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仓皇南逃。次日下午，毛泽东手执登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电文的报纸，感慨万千，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七律一首：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分路向南挺进。中、东两路直下沪杭，先后解放了杭州、上海，西路直取九江、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则从湖北境内强渡长江，解放了武汉三镇。继之，各路野战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挥戈猛进，扫荡残敌。到 1949 年秋季，除西南和广东、广西等部分地区外，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600 余万人，摧毁了国民党的各级反动政权。此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这项工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就有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研究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

会议认为，蒋介石手中虽然还有数百万军队，控制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已是强弩之末，彻底消灭他们为时不远。在这种形势下，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业已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和全国发布庆祝五一

劳动节系列口号。其中第五条是：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对此专门解释说：“召开新政协的口号，是行动的口号，不是宣传的口号。”

城南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构成、组织形式及实现步骤作了周密研究。

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给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沈钧儒写信，提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共同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在当年秋季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还亲自拟出了一个联合声明草案，一并寄往征求意见。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特别是民主党派和知名进步人士聚居的香港和上海等地为之震动。

5月5日，民革中央李济深、何香凝，民盟中央沈钧儒、章伯钧，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痛斥蒋介石勾结美帝、窃权卖国，伪装民主、压迫人民的罪恶行径，盛赞中共中央的主张适合时势的要求，表示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同日，他们又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提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设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举行了常务理事会，一致赞同中共五一口号。会议决定委派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中央的态度。

6月4日，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 125 人联合发表声明，指出“新的政协召开之日，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

接着，何香凝等 200 余名著名女士也联合发表宣言，决心同全国妇女一起立即行动起来，实现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主张。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就连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法国以及古巴的许多华侨组织也都纷纷致电毛泽东，表达了他们的心愿。

中共中央对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的积极态度十分重视和欢迎。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等人，电文言词恳切：

诸先生赞同敝克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开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

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要求他们立即将毛泽东的复电送达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广泛征求意见，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筹备工作。

从 1948 年 9 月至次年春 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分批离港北上，通过秘密途径顺利抵达东北和华北等解放区，开始参与筹建新政协的工作。

海外侨胞历来关心祖国的命运，同中国革命联系密切。当年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就从旅居欧美、日本和南洋的华侨中得到了很大的援助。毛泽东深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能缺少这支力量。创建新中国、沟通未来国家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不能离开爱国华侨的帮助。就在香港民主人士纷纷北来的同时，毛泽东又亲自给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和美洲华侨首领司徒美堂分别写信，热情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在给陈嘉庚的信中，毛泽东说：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陈嘉庚喜接毛泽东的邀请信，立即复电，对革命大功将告完成表示祝贺，并同意接受邀请。

6月4日，陈嘉庚经香港辗转抵达北平，受到中共元老董必武以及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等人的热烈欢迎。两天后，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身来，亲自前往陈嘉庚的下榻处看望，并接他与毛泽东晤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和陈嘉庚的交谈十分融洽，虽然他们是初次见面，却像故友重逢，格外亲切。中共领袖们的热情、友好和政治家风度给这位华侨领袖以极深的印象。这位华侨领袖从此对共产党和中共领导更加信赖。他于1950年正式回国定居，并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后话。

两个月后，司徒美堂也冲破重重险阻，从美国乘船抵达天津，后又乘火车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他与陈嘉庚同住北京饭店。不久他们又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日理万机、精心部署各路大军追剿国民党顽敌和紧张筹备新政协的日子里，毛泽东还两次亲往北平车站，迎接爱国民主人士。一次是国民党元老、长沙起义有功将领程潜，另一次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党外最具名望的进步人士之一。她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并同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宋庆龄挺身而出，与之斗争。当年她曾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联合发表讨蒋通电；抗日战争中，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在国共两党生死决战的解放

战争时期，她身居上海，心系解放区，把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身上。对此蒋介石虽然忌恨在心，但碍于宋庆龄的名望和国内外的舆论，几次欲加害于她，而始终未敢下手。

共产党的领袖们非常盼望宋庆龄能够参加筹建新中国的活动。为此毛泽东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同周恩来联名发电邀请宋庆龄北上。当时上海尚未解放，宋庆龄身处险境，无法复电。

5 月 27 日，上海刚刚解放，毛泽东就委派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前往宋宅看望，陈毅还专门派解放军为她站岗放哨。进入 6 月中旬，政协筹备会已经举行，眼看建国之日临近，宋庆龄仍未北来，这使毛泽东十分着急。

他立即请来周恩来，经二人仔细研究，决定派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

商量妥之后，毛泽东当即提起羊毫，铺开一张白纸，眉头略皱了一下，挥笔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值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陪同邓颖超同行的是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的廖梦醒女士。廖梦醒是孙中山的老战友廖仲恺的女儿。当年孙、廖二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他们去世虽然多年，但两家后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友情。一到上海，廖梦醒就独自来到宋公馆，告知邓颖超受毛泽东之托已亲到上海接她北上。

此时的宋庆龄悲喜交集。悲的是自从孙中山病逝北平，她就害怕听到“北平”二字，那是她梦断魂伤之地！喜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功成不忘故旧，对她如此敬重，前不久来电，今又来人，请她参加建国大事。

盛情难却，宋庆龄很快决定接受邀请，同邓颖超一起前往北平。

8月28日下午，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入北平。车站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伫立迎候。

列车停稳后，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缓步走下。毛泽东大步趋前，面带微笑，握住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一路上辛苦了，欢迎您来到北平。”中共其他领导人也一一上前问候。身着黑色旗袍、系着白绸巾的宋庆龄面带激动，连声答谢。

至此，曾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各界民主人士都来到了北平，同刚刚打下江山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

群贤毕至，盛况空前。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举行。

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画像中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幕后，伴随着场内的如雷

掌声 场外的 54 门礼炮一齐轰鸣，声音惊天动地。毛泽东的每一句开幕词都打动着代表们的心，代表们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中也都受到鼓舞和振奋。毛泽东说：

“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据说，当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齐声轰鸣时，北平曾一度雷电交加 但旋即雨过风止 晴空万里。老百姓们纷纷传说：“ 这是新旧历史交替的象征——黑云压城、群魔乱舞的时代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新时代。”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 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都和国歌等重要决议。

9 月 30 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会议的高潮，进行了两项选举。

首先选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80 人。毛泽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接着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等 56 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在紧张的建国筹备中，最累的是毛泽东。他既要考虑各项人事安排，又要和各位党外人士协商；既要谋划建国后的各项工

作，又要处理前线的战事，为此，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政协闭会当晚，他批阅了几份重要军事电报，又在办公室里起草准备第二天向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夜伏案，未曾休息。黎明时分，毛泽东身披一件旧棉衣，手里拿着刚刚写好的《公告》草稿，步入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也正埋头工作，他见毛泽东进来，赶紧起身问候：“主席还没休息？”毛泽东微笑道：“你不是也没有休息吗？”

两个人都笑了。他们坐到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公告》的内容和措辞，直到修改完毕，才各回寝室，闭了一会儿眼睛。

1949年10月1日，北京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将于这一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大会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座雄伟壮观的城楼坐北朝南，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城楼高约35米。巨大的红色圆柱，金黄的琉璃瓦，白色的城楼栏杆，加上飞檐凌空，斗拱成排，汇成了一派富丽堂皇、溢彩流金的非凡气势。天安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有精美的汉白玉石桥，河畔有雄狮一对，蟠龙华表竖立于城门左右。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八个大型红色宫灯，显出一派喜庆的气氛。城楼檐上高高扯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的横幅会标，城门上方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一根22米高的白色旗杆直立在广场正中，并且装好了电动升旗装置。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接着，正、副主席宣布就职，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